

# 安源實錄

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于建嵘★著

## 安源实录

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安源——劳工神圣的策源地

革命红利耗尽 遍地英雄夕烟

安源——盛世风景下的癌灶

稳定底线告警 暮钟为谁而鸣

一个知识分子的国家守望

# 安源实录

## 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于建嵘★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于建嵘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2  
ISBN 978-7-214-06807-1

I. ①安… II. ①于… III. ①工人阶级—研究—中国  
IV. ①D6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3837号

- 书 名 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著 者 于建嵘  
责任编辑 丁嫣霞  
策划编辑 黎学文  
特约编辑 宋 甜  
文字校对 刘彦章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57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807-1  
定 价 3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于建嵘：心牵国运的知识分子（代序）

裴宜理

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于建嵘教授这本关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作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著，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数年来，他潜心研究安源工人，在搜集、分析文献资料的同时，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另外，于建嵘本人成长于安源附近的湖南工人阶级家庭，因此，对于本书的撰写，他既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又有真挚的感情投入。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罕见的组合，造就出了《安源实录》这部卓绝的学术研究。本书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家的高度关注，而且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在学术层面上，于建嵘的研究做出了为数不少的重要贡献。从实证的角度看，他提供了关于安源工人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丰富历史记录——从1922年的大罢工到今天的退休工人的抗议活动。从分析的角度看，他解构了“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揭示了工人内部的分野——告诉我们这些工人在雇佣、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状况相当不同。而这差异也并非仅仅基于时间，也因工种的不同而参差不齐。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建嵘的研究是建立在娴熟掌握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既有文献基础上的。他并没有仅仅把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套用到他的研究对象上；相反，他让安源的工人们为他们自己说话。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世界的珍贵而振奋人心的第一手观察。

基于在农村进行的大量田野工作，于建嵘能够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比较。很多接受采访的矿工的家庭仍在农村（大多在湖南、湖北及江西），他们自己也是游走于村庄和矿厂之间。尽管如此，这些矿工仍然可以清楚地感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悬殊——而这种阶级的差异给过去一代的中国工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于建嵘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结识的许多干部都令人印象深刻。显然，他们深深地关心着煤矿工人并为他们的安危利益不倦地工作着。但即便如此，横亘在工人和干部之间的鸿沟却依然明确无误地在工人的访谈中得以体现。

本书呈现的另一个特点是：今天的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敬意仍然十分强烈。从他们对于建嵘本人的欢迎和尊敬的态度就可见一斑。尽管于建嵘反复提醒他的受访者他仅仅是一名学者，并不能够为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然而，工人们依然把他受到的教育看做是学术和政治资源。人们会禁不住设想，未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像于建嵘这样谨慎地在学术和政治中间画出一条清晰界限的话——有可能会在不满的工人中发挥爆炸性的影响。如果国家希望避免这样的挑战的话，一个良好的建议无疑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由此消解在政治上有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煽动者（更不用说秘密社会帮派分子的诱惑）潜在的吸引力。于建嵘正确地强调了对有效的工会和法律机构的现实需要——它们可以起到疏导规范和调解仲裁工人们不满情绪的作用。

本书既是中国工人阶级韧性的一部见证，也是对那些有足够好奇心和勇气，勇敢走出舒适的学院办公室、深入到乡村严酷现实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见证。于建嵘在重重阻挠和个人困难面前毫不畏缩的坚持，不仅仅对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形成了鼓舞，更为所有准备在中国基层进行田野工作的人做出了榜样。于建嵘曾数次访问安源。在那里，他忍受着许多其他城市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的环境（甚至包括冒险爬下矿井以体验地层深处的生存）。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去挖掘他的受访者的真实想法——而非把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强加于受访者。这些努力使他得以完成这部杰作。

对于建嵘来说，安源矿工成为了国家工人阶级历程的一个象征，正如英格兰纺织工人对于汤普森一样。无论从历史还是比较的角度，中国工人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更说明了为什么于建嵘的著作作出了如此精彩纷呈而又至关重要的贡献。

（作者系哈佛大学亨利·罗佐夫斯基政治学讲席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 目录 CONTENTS

于建嵘：心牵国运的知识分子（代序）… 裴宜理 / 001

## 上 篇 | 社会变迁中的工人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 / 002

萍乡的大钟停了 / 007

初识安源 / 011

第一个访谈 / 016

安源人心中的安源 / 019

食堂里结交的朋友 / 028

宿舍门口的“站谈会” / 030

走进安源的“三角地” / 032

地摊边的苦难 / 039

危险的信号 / 041

再访安源 / 046

下岗再就业中心的感叹 / 059

求援武汉 / 064

总平巷的牢骚 / 065

有话就说 / 067  
白领工人的想法 / 069  
下岗失业工人的担忧 / 073  
矿医院 / 076  
劳动用工合同 / 079  
险遭扣押 / 087  
党史专家的分析 / 090  
郑先生论行帮 / 095  
招待所的哭泣声 / 102  
孙主任的感动 / 105  
干部的责任 / 110  
“工人知识分子” / 115  
矿票就是剥削 / 118  
老工人心中的福利 / 122  
井下纪实 / 125  
全国劳模的苦恼 / 129  
矿工与“矿工”的对话 / 131  
矽肺病人的痛苦 / 133  
工伤者说 / 139  
工会主席的实话 / 142  
冰窖里的抱怨 / 146  
矿工的工资 / 150  
思想政治工作 / 157  
矿工的心愿 / 161  
纪念馆前的争论 / 164  
区务公开 / 168  
采一区的工人们 / 173  
肖建军的命运 / 178

破产的高坑矿 / 181  
采五区的干部们 / 184  
职工的心态 / 192  
书记的信心 / 196  
徐勇教授到安源 / 199  
安源的期待 / 204

## 中 篇 | 工人行动中的政治

>>> >>

工农维权与抗争性政治 / 210  
两封上访信 / 215  
党委书记的委婉警告 / 219  
工人策略 / 224  
重启历史的记忆 / 237  
工人代表们 / 245  
八月事件 / 250  
新的行动 / 252  
阶级的意义 / 262  
在岗职工的评价 / 272  
集体行动的根据 / 277  
搭便车者说 / 283  
质疑执政能力 / 288  
比较的逻辑 / 298  
法律的无奈 / 304  
《维权简讯》 / 311  
以理维权 / 316  
暂别安源 / 320



下 篇 | 我的结论  
>>> >>

研究评述 / 322

迷失的阶级 / 324

非阶级行动 / 329

利益组织化 / 335

后 记

附 录

图表索引 / 340

访谈索引 / 342

参考文献 / 345

## 上篇 | 社会变迁中的工人

2001年5月1日是新世纪第一个国际劳动节。上午10时，我从故乡湖南衡阳登上了由南宁开往无锡的1380次列车，开始了江西安源之行。此行目的是要深入到这个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红色之都”的地方，观察和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

2001年5月1日是新世纪第一个国际劳动节。上午10时，我从故乡湖南衡阳登上了由南宁开往无锡的1380次列车，开始了江西安源之行。此行目的是要深入到这个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红色之都”的地方，观察和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应该说，要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中国的工人阶级，研究“他们的要求，研究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sup>[1]</sup>是我在20年前就曾有的计划。当时我还是湖南一所大学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在研读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被恩格斯详尽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所震撼。这种震撼不仅由于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工人家庭，我的亲人大都是工人，对工人这一社会群体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主要的在于，我被恩格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吸引了。在我看来，恩格斯在研究中所坚持的实证主义精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缺少的。当时我就有了一个计划，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世界的人民也知道中国工人的历程和苦难，光荣和梦想。

然而，我却一直没有勇气来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当我试图以实证的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时，我发现自己工人家庭出身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的经历时刻在干扰着我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判断。种种困惑让我最终认识到：如果没有理论研究的视角，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便无法进行客观公正的观察，也不可能最终获得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于是，我将这一计划搁置起来，转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希望从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中寻找观察到工人问题的视野和方法。为此，我遍游中国名校，普访各地名师，进行了近20年的努力和寻找。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我来到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师从著名政治学家徐勇教授，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徐勇教授特别强调实证研究，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必须进行艰苦的个案研究，要在实证

[1](德)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A].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78.

中寻找理论突破和创造的契机。正是根据徐勇教授的要求，我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sup>[1]</sup>当完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感到应该是实施20年前计划的时候了。因此，我决定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将多年来对中国工人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行阶段性总结，并选择了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研究的表述对象。

在离开武汉回故乡之前，我向徐勇教授报告了自己有关工人问题的研究设想。他对我以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对象来研究中国工人问题的计划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他认为：

安源调查是有典型性的。因为，安源煤矿作为中国最早的近现代企业之一，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它事实上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缩影：既历经自然经济，又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特点，现又面临着市场经济冲击和知识社会（新经济）的挑战。这三种社会形态和矛盾的交织，是解释中国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根源。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一社会转变中，与农村联系最多的煤矿产业工人的命运最为独特。他们主要以体力劳动为生，又缺乏城市文明的陶冶；他们是农民中的工人，工人中的农民。可以说，安源是中国社会最具典型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化石。

为了使我前期的农民问题研究与现在的工人问题研究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徐勇教授向我推荐了一篇介绍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教授研究成就、特点和方法的文章。<sup>[2]</sup>裴教授的著作我没有读过，但我认真研究过她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几篇论文。总的感觉是，这些海外中国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一般有着很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而且要比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具体和全面。这首先表现在研究的领域上，海外学者不像国内学者，只关注某

[1]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于2001年在商务印书馆以《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为名出版。

[2]朱政惠·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J].世纪书窗,2000,(4):28.

一方面的问题，研究农民的不研究工人，研究革命史的不研究经济史，而是将中国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来考察，大都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对某一问题或现象作出解释。其次是在方法论上，海外学者一般都能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机联系在一起，能做到研究方法真正为研究服务。而国内的许多学者却往往会受到方法的局限，许多人为的学科界线将社会解释成了七零八落的板块。当然，虽然海外学者能更客观、直率地看待中国问题，但由于毕竟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隔靴挠痒的偏颇也就会存在。<sup>[1]</sup>而且从实证方面来说，这些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要受到很多政治、文化甚至语言的限制，在事实上很难真正深入到中国现实社会之中。

可是，尽管国内学者有着深入中国社会的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却鲜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原创性社会理论成果产生。国内学者有关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的著作，不是对权威的解释和注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宣讲和论证，很少有根据对中国工人阶级历史和现实状况的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其中有些甚至可被称为伪学术和伪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那么，问题出在何处呢？

我曾经苦苦思索过。<sup>[2]</sup>我认为，中国崇尚权威的价值判断之学术传统，首先应该对中国社会理论的危机承担责任。对事实和理性都进行价值判断，是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一。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而是指中国学术传统那种从理念到事实的思维定势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先哲，还是正在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家们，都不大习惯从事实的本身去理解其中的理性精神，不愿考究“为什么会这样”这类有关事实理性的问题，而偏好于对事实进行“应该如何”此类有关对与错、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就是在回答“发生了什么”此类有关事实本身的问题时，也多是按预定的价值标准进行取舍和判断。而这些作为评判标准的“价值”，却大都是依据权威的理论和高高在上的权力。这样，社会理论研究的目标只不过是权威的诠注，对政策的论证。中国大量的社

[1] 朱政惠，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J]，世纪书窗，2000，(4)：28。

[2] 参见：朱宗伟，于建嵘，现代经济分析的原则和工具——社会科学分析范式的革命[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会理论研究成果，就是对那些经典理论的注解或通过对这些权威理论引申所得出的结论。

但如果深究和检讨这些貌似科学的伪学术产生的原因，又与中国学者的生存状况和与此相联系的思想自由状况有关。因为，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家和理论家特别是社会理论家，大都是主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附属。对主流社会的生存依附，是社会科学家失去独立的学术精神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当代中国，当社会科学家们从传统的经院式研究走出来时，呼吸的不仅是社会实践的空气，更多的是生存压迫和心灵自由的让渡。当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课题费、为了职称而从事着这些神圣的事业时，急功近利的态度也就成为必然。那些被封为现时代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们，甚至已经可怜到要去论证和宣传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论，因为这些观点已与他们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了。

因此，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最为需要的就是以人类的科学理性和学术的实证精神来真诚和勇敢地面对中国最广大民众的苦难。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以一种新的批判精神和求实的态度，走进工厂和矿山，深入地了解 and 解读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及所产生的问题。

毫无疑问，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这是具有理论和政治双重风险的。这首先在于，按照目前流行的政治话语，工人阶级是现行社会体制最为坚实的基础。虽然在主流的意识文本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工厂或企业的破产、工人失业、劳动保障、工人组织和民主权利及工人群体性事件等相关问题的论述，但在那里，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那些有影响的理论家以及流行而时髦的学术成果中，这些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逐渐离开社会现实生活，成为一个“纯学术”的理论问题。他们为了某种社会秩序结构或社会发展预期，要求那些已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再为“改革作出牺牲”，且在舒适的享受中，不惜笔墨地论证这种牺牲的合理性。在这些理论家们眼里，那些生活在贫困中、为了生计奔波又孤立无援的下岗工人们，只不过是一个个报废了的机器零件。我经常为他们所具有的“冰冷理性”感到惊讶，也常常怀疑这种理性后面是否已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因此，可以预见，当我们试图

以人文关怀来对待那些普通劳动者的苦难时，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而遭受各种攻击。这并不可怕。因为我坚信，“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体现着这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程度。”

当然，我还意识到了另一种危险的存在。这就是，当我们深入到中国劳动群体之中后，就会强烈地感到那普遍存在的对社会不满的情绪。这些社会弱者的呐喊，同样能使我们的同情心发挥到极限，甚至会让那痛苦的眼泪扰乱那需要智慧和判断力的观察。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工人群体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的同时，不去简单迎合这些情绪。我们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产生这些社会情绪的根源，寻找使他们摆脱苦难和不满的方法和途径。

俄国思想家恩·弗列罗夫斯基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力求指明，社会肩负着何种真正巨大的责任，即使骤然看来这一伟大事业对它来说似乎是无法实现和不可能的，那么也得让它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只有带着严肃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情才有可能完成真正美好的事业。”<sup>[1]</sup>我想，这同样是我所要努力的方向。

---

[1](俄)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0.

## 萍乡的大钟停了

节日的火车上乘客如织，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于下午1时18分到达了江西省萍乡市。

萍乡市位于江西省的西部，被称为赣西门户，距省会南昌约294公里，东靠宜春市、安福县，南邻湖南的攸县，西接湖南的醴陵市，北连湖南的浏阳县。萍乡市作为江西省辖市，现辖芦溪、上栗、莲花三县，安源、湘东两区和省级经济开发区安源经济开发区，总面积3827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约35平方公里，人口约178万。境内浙赣铁路横贯东西，319国道和320国道交会通过，已成为沟通南昌、福州、上海、长沙、武汉、郑州、北京、昆明、重庆、广州等地的交通要地，被称为“地界吴楚，水接潇湘”。

我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首先想到的是搞清楚这个地方的名称由来，这已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一个习惯。因此，在这次到萍乡市之前，我就在图书馆和互联网上查阅了大量的介绍萍乡的文献。据《萍乡市志》及有关宣传资料称：

西周时，萍乡隶属扬州；春秋属吴国；战国为楚地；汉高祖刘邦时属豫章郡宜春县地；三国吴帝孙皓于宝鼎二年（267年）设立萍乡县。《宋书》州郡（二）曰：“萍乡侯相，吴立。”这是萍乡设县的最早记载。而其名称由来，自宋至今说法不一，是历史上有争议的旧案。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说法，即：“萍实说”、“萍草说”、“北民南迁说”。“萍实说”在萍乡流传较早且较为广泛，历届县志均有记载，其典故出自《孔子家语》，说的是有一次楚昭王渡江时，江上漂来一物，又红又圆，大小像斗（斗为古代酒器），他问遍满朝文武都无人知道这是何物。于是派人到鲁国去问孔子，孔子回答说，是萍实，吉祥物，只有能称霸的人才能得到它。使者回来后告知昭王，昭王便吃了萍实，味道很好。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萍乡“楚昭王渡江获实于此，今县北有萍实里，楚王台，因以名县”。“萍草说”则认为萍乡得名于萍草，“萍乡”二字本为草



之乡之意。按《郡县释名地理志》曰：“萍，皆作苹或作三字同韵，在词也多为同义。”因而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以地多生萍草，因以为名。”作者久任宰相，熟悉当时图经，记载详细，引证有据，绝不可能顾名思义，妄自造次。《大清一统志辑要》、《补三国疆域志》、《中国市县手册》等书，均持此说。“北民南迁说”称，古代中原民族南移，名不忘本。验之江西，如豫章、九江、浔阳、都昌、七阳、上蔡、新昌等皆北方旧名。萍乡之名，当即沿用汉志广平之平乡。汉末孙吴立县时，其四邻旧有之县，均沿用中原旧名，若“平”之转变为“苹”（《新唐书》），再为“萍”，古今地名，字形传写，随时遽变，其例甚多，可无庸作字义之解释矣！<sup>[1]</sup>

看来，三种说法各有其据，很难达到统一，也就成了萍乡知识界的一桩公案。但是，从萍乡近年印制的相关宣传资料来看，还是主张“萍实说”，因为此说不仅有吉祥之意，而且还与中国的第一大名人孔子相联。这的确很符合中国民众的心态。可见，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追究一个地方名称的来源对于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是很有意义的。但不管“萍乡”名称来由如何，其自三国·吴宝鼎二年孙皓置县，迄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则是非常确定的。

在火车站台上，我见到了从湘潭赶来的王立成。王立成是我大学的同学，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在大学时代就是非常好的朋友，而我们的友谊根基于对中国劳动群体的关注。大学毕业时，我们一些同学曾在岳麓山上的黄兴墓前有过约定：今生无论自己的生活境况如何，都要将中国劳动群体的苦难作为我们关注的核心。考虑到各自的情况，我们在研究方向上做过分工：由于我出生在城市，为有更全面的视野，就先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而他出身农村，则先研究工厂和工人问题。因此，王立成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法学硕士毕业后，本来有许多机会进入党政机关，但他还是选择了许多高学历者不屑为职的湘潭市总工会，专事工人问题研究。这些年来，他的研究在全国工会界也小有名气。但是，可能与他经受的学术训练和研究条件有关，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规范研究，研究成果也

[1] 参见：萍乡市志编纂委员会. 萍乡市志 [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1318-1319.